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

根据地 经济建设研究

GEN JU DE
JING JI JIAN SHE YAN JIU

6-53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

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印刷协会实验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78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7-203-03477-1

G · 1515 定价:19.00 元

序 言

梁志祥

正值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一书问世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党史研究与现实结合、为现实服务，是党史工作的价值所在，也是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一书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以历史资料为素材，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对我党在领导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对从根据地经济建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然联系进行了探索。这是很有独到之处的。

本书收编的论文，主要论述了抗日战争以来以山西为中心的几个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山西为基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创建和发展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撑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根据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两个历史时期 12 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根据地全面建

设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不论是政治建设，还是军事建设，不论是党的建设，还是政权建设，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其经验在今天看来都有借鉴的价值。10多年来，我们在党史征研工作中，对根据地建设经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正在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效益。但总的看來，对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虽然曾有一些研究水平较高的论文发表，但也有不少文章局限于史料的简单罗列，对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所体现的固有规律及其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指导作用，揭示得不够。

在战火纷飞中诞生和成长的革命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我党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执行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其中所蕴含着的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及各项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仍不失其指导作用。我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根据地经济建设成功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研究和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得与失，可以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理解，领悟从根据地经济建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联系，提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彰往而察来”是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史学工作者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关注历史的前途，把握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振兴历史科学，拿出社会认可的产品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服务。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原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新成立的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连续组织党史研究部门、经济研究部门和大专院校一些科研、教学人员，围绕以山西为支点的各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实际，写出了一批专题

研究文章，经过加工，形成了这本《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论文集。

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是党史和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不断深化和提高。本书的编辑出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望广大党史工作者和科研、教学人员，加强切磋与争鸣，以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序言作者系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目 录

序 言	梁志祥	(1)
植根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邓小平		
经济思想萌芽	亥 华	(1)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杜玉芝 张国祥	(15)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构成及其客观依据	姚寅虎	(43)
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 的成功之本	景占魁	(54)
试论太行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霍成勋 梁素梅	(74)
晋绥革命根据地生产运动中		
经济手段的运用	杨玉潭	(84)
《滕杨方案》的出台及其意义	郭秀翔	(98)
晋绥边区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经验	赵 冀 杨桂兰	(106)
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商业的 几点启示	杨经平	(118)
论晋察冀边区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历史意义	巨文辉	(127)
试论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战时财政	唐执升	(145)
关于晋绥边区财政问题的探讨	李树萱 牛丽平	(162)
论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对财政 困难的克服	温抗战	(176)

试析 1946 年太行区的整理财政工作	王卫民	(189)
略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稅收	牛崇辉	(199)
华北根据地的关税沿革及其作用	郑慧孜 刘淑兰	(210)
抗日战争中的晋冀鲁豫边区金融货币工作	冯田夫	(225)
浅议刘少白、牛友兰创办农民银行及其对 根据地经济发展的贡献	梁 正	(239)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对外贸易统制		
政策初探	王庆成	(246)
晋察冀边区的交通邮政及其		
企业化尝试	李茂盛 赵万钧	(263)
精兵简政新论	陈文秀	(273)
试述太行抗日根据地减轻人民负担的		
作法及其意义	许瑞凤	(284)
沁源城关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		
历史考察	董 谦 张剑峰 方留碧	(295)
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推动晋绥边区劳武结合运动	王卫香	(308)
邓小平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倡导科技		
兴农的启迪	赵秀山	(314)
科学技术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王晋源	(323)
晋绥土改、整党中的“左”倾错误对		
经济建设的影响及其历史启示	王雷平	(336)
后记		(359)



亥 华

植根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 邓小平经济思想萌芽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参加了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领导。期间，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量，对敌后根据地经济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形成了一种有特征的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以及发展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植根于太行山上、萌芽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块土壤之中的。

一、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障抗日军队的供给，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以激发其抗日的积极性，从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党十分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

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不会被伤着的。”^① 在敌后领导抗日斗争的邓小平，从切身的实践中，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于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翌年3月16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提议召开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并由北方局提出包括财政经济内容在内的对晋冀豫边区当时建设的15项主张。以这15项主张为基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施政纲领，提出了“努力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② 的任务。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③ 是“坚持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保障”^④ 等著名论断。这些论断的含义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首先，它充分反映了当时对敌斗争的要求。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军事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上，对于经济建设不可能予以充分重视。随着日军进攻的主要矛头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根据地遇到了新的困难：一是日军的频繁扫荡使根据地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二是当权的国民党停止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经济上的接济，三是根据地处于被分割、被封锁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做为抗日战略支点的根据地，不但需要解决军队的供给问题，以坚持抗日斗争，而且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以动员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下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年版，第846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77页。

③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0页。

④ 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上的结论（1943年2月22日）。

群众全力支援抗日战争。因此，发展经济成了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任务。其次，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各种抗日武装开辟的，它担负着反帝反封建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任务，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主要内容之一。只有如此，才能大力发展公私生产，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党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拥护我们党的主张，自觉地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最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说到底是要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对生产力的破坏和束缚，清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中，邓小平十分强调把发展生产事业当作主攻的方向，并要求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作为生产的重心。邓小平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用民食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①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领导机关，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农业、副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状况日趋好转。可以说，敌后军民所以能够以低劣的武器、简陋的装备，在没有经济接济的条件下与强大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根据地以发展生产为基础，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增加了根据地的财力，获得了坚持敌后抗战的物质保证。

^①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0页。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十分注重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主张积极推进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区域是山区和农村，其主要社会矛盾除了日本侵略者与人民大众的民族矛盾之外，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历史延续下来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广大农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在根据地解决生产关系问题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民和地主矛盾的关系。为此，中共中央根据民族矛盾突出的实际情况，于1942年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和指示，制定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邓小平对中央的土地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是调整和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不但是调动各方面抗日积极性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根据地生产建设的重要措施。1942年春邓小平在太岳区视察工作期间，就强调要把经济建设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所谓群众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4年11月，邓小平又在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发展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必须做好三件事，其中一、二两件就是减租减息和组织起来。邓小平指出，必须彻底实行政府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法令，“这个工作做得不好，就无法使广大劳苦农民获得生产的条件，即地主也无法坚定地建立自己的家务”^①。只有搞好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生产运动才能更好更大地开展起来。邓小平还指出，必须更好地组织起来，“发展更多的互助社、工农队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一切劳动力都组织到生产里来，

^①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5页。

提高劳动效率”^①。这两件事都是着手于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带有特定的含义，但其基本思路和精神则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意义，孕育着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萌芽。

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力作用。

在经济分散、生产力落后而又被敌人封锁和分割的农村，根据地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劳动英雄和生产能手在实践中的发明创造，却显示出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力量。对于这些发明创造，邓小平十分重视。他在前述发展根据地生产的三件事中的第三件，就是把经验与科学结合起来。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②。他以改良种子为例，作了如下的说明：金皇后玉茭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小麦优良品种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以多打粮食 100 万石以上，“这种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③。提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就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找到了一种推动的力量，说明发展生产必须靠科学发明，靠科学创造，靠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促进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从各方面为科技的发展创造条件。这里提出两点：一是尽一切努力招纳各种技术人才。从发展生产的角度看，与其说技术决定一切，不如说人才决定一切，所以，根据地曾规定要坚决把那些在战争中中途改行的、学非所用的专门家使用起来，分配到

①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第 35 页。

② 同①。

③ 同①。

经济战线上，为其创造比较优越的条件，充分发挥其技术专长；甚至可以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重金聘用各种专家和技术人才到根据地工作，以推动根据地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奖励各种发明创造。尽管根据地的经济比较困难，各种工作人员只能享受供给制的待遇，生活水平很低，但对科学发明还是实行了一定的物质奖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对工农业生产中的发明创造，发给 50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奖金；凡有重大发明、对根据地贡献极大者，发给特别之奖金。并规定有正确的设计而无能力实验者，可将设计以书面详细说明，由政府提供试验费用和试验场所，试验成功之后，可以受到奖励。由于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根据地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方面，发明创造不断出现，显示了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的推动力量。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论断，是很有远见的，是他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萌芽。

二、科学地解释自给自足经济的含义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以独立自主为原则、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但是，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排除商品交易和对外贸易。邓小平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对自给自足和商品交易、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1943 年 2 月，邓小平指出，在严重的灾荒、敌人残酷的粮食掠夺、经济封锁和根据地社会积累很少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其意义“尤为重大”；“如果不从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着眼，必将遇到严重的困难”；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农村中的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主要解决根据地人民自身的需要，

但同时应注意输出品的生产，去以有易无。”^① 邓小平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出发，对自给自足经济的含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地人民需用的东西，主要由根据地人民生产；另一方面，是逐渐争取输出与输入的平衡乃至相当的出超，不逐渐解决出入平衡的问题，同样不能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这就是说，根据地立足于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同时并不排除商品交易，并不拒绝对外贸易。因为进行商品交易、发展对外贸易，才能造成根据地内部经济的繁荣与富强；才能抵制敌货的倾销，限制原料资敌；才能搞活根据地内部的商品流通，吸收日用必需品入境，满足与调节人民生活的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和充实了贸易机构，鼓励私人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动员很多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为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根据地的贸易方针是对内自由、对外统制。对内自由是为了促进根据地的商业流通，对外统制是为了保护根据地工商业不受日伪的破坏。之所以采取这种保护主义的贸易方针，主要是由于根据地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制品还不能与日伪的工业品进行自由竞争所致。如果不在输出、输入方面采取保护主义，根据地的工商业就可能被挤垮。但是，这种保护主义绝不是闭关自守、绝不是限制商人的贸易自由，也不是禁止一切敌货的输入。因为根据地的经济还不能达到完全自给自足的程度，对于某些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设法张开入口是必要的；这种保护主义也不是禁止一切土货出口，因为除自给自足之外，组织多余的土货出口，可以换回根据地必需的东西，这也是建设根据地所需要的。同时，采取保护主义也不是由贸易机构包办和独占进出口贸易，而是欢迎与组织内外商人在遵守民主政府规定、

① 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上的结论（1943年2月22日）。

依法缴纳税款的前提下，参与进出口贸易，给以“合法赚钱”的机会，这对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对自给自足经济的科学解释及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下努力发展自给自足经济，同时并不排除商品交易和对外贸易的辩证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及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三、提倡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

在领导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他在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经验时，深刻地指出：“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①“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②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面临着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和破坏，二是处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之中，三是民族经济以农业为主体，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几乎不存在。根据这些特点，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必须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必须注意到工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句话，必须符合新民主主义的要求。

邓小平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进行实际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就经济政策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醒人的论断和独特的见解。

①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0页。

②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6页。

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鼓励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40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谈到财政经济政策时就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并且都可奖励。”^①1944年12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有三个环节：第一是扶助贫农、中农上升，第二是奖励富农经济，第三是削弱封建剥削。这三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其奋斗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铲除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如毛泽东多次指出的，革命只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绝不能脱离现实的实际，限制和禁止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而只能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事业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统治地位，极少数的工业也是私人资本，公营经济只是一部分。在限制封建剥削的条件下，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使贫的变富，富的更富，通过民富，达到国富，不但可以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保证抗日军民的供给，而且有利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如果害怕富农经济，禁止其存在，害怕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其发展，在根据地公营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上的发言（1940年4月）。

^② 《在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5页。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保护、奖励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使一些富有者把自己的资本转入了生产，私营工业和群众性的合作工业都有了发展，在公营工业中也吸收了一部分私人资本和敌占城市的工商资本，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针，邓小平极力主张在部队、机关的大生产中，对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在分配中给予照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对劳动者的收益分配，曾经出现过抹煞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着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为了纠正这种倾向，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允许劳动者将劳动所得据为己有。1943年9月，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生产动员大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要规定，对于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要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并指出：“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又不是贪污，是应该的。”^① 在当时来说，这一思想是十分宝贵的。它完全符合根据地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工作的一般规律，也是符合当时劳动者的觉悟程度的。同时，毛泽东也主张在公营经济中实行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和副参谋长杨立三于1944年4月制定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正是这些思想的体现。《方案》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一些奇谈怪论，正确地处理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方案》指出：“我们过去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把共产党骨干的思想观点作为群众的

^① 转引自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85页。